



南社词人研究

A Study on the Tz'u-poets of Nanshe

汪梦川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南社词人研究

A Study on the Tz'u-poets of Nanshe

汪梦川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社词人研究 / 汪梦川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11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5325-7798-9

I. ①南… II. ①汪… III. ①南社—词人—研究
IV. ①I207.23②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18234 号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南社词人研究

汪梦川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00 × 1000 1/16 印张 36.5 插页 2 字数 635,000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00

ISBN 978-7-5325-7798-9

I · 2969 定价: 11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2FZW04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类别之一,旨在鼓励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治学,扎实研究,多出优秀成果,进一步发挥国家社科基金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示范引导作用。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已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以资助学术专著为主,也资助少量学术价值较高的资料汇编和学术含量较高的工具书。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学术影响,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前 言

中国文学的研究领域有所谓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当代文学三大块，事实上这种明显借用历史分期的方式来划分文学，未免失于简单化。因为历史是渐变的，社会不会因为朝代的更迭或某一历史事件的发生而在某个时间节点前后明显变得不同，文学就更不会在特定时间或特定事件之后立刻对社会作出不同的反应。“文学史固然亦属历史之畴，可是文学发展的史程与以社会性质演变为指认的历史行程并非是相互可能取代或假借，两者有时很不同步。”^①如果对历史的硬性分期尚且没有逻辑依据，那么对文学的分期就更没有说服力。一些所谓分期的标志事件，与其说是文学史上的转折点，还不如说是人为设置的分割线而已。至于在近代文学之下，更有两段论、三段论或者四段论的细致分期^②，那就更没有必要。而且这些分期方式主要着眼于所谓时代性，偏重文学的思想内容而忽略文学的各种不同形式。所以几乎所有的分期都是紧扣政治，以某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为界线，文学成了历史（或曰政治）的注脚和工具，“把文学史（特别是近代文学史）当成直接的政治思想史和斗争史。文学作品和其他文学现象，只是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资料。不理睬（或不完全理会）文学、艺术反映生活的广泛性和特殊性，不理睬作家（特别是生活在大变动时期的作家）思想、艺术的复杂性”。^③这些因素导致历来对文学价值评判的偏差，即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错位。但是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高级的精神文化，所以艺术性应该是第一位的，没有艺术性就没有永久的价值，只能随着政治的兴替和时代的变迁而湮没。

① 严迪昌：《近代词钞》，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② 连燕堂：《近代文学的断代与分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中国近代文学百题》，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③ 钟敬文：《谈谈近代文学研究的一些问题》，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编辑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第一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页。

文学史的具体情况非常复杂,任何分期方式都难免有其缺点。但是对任何一种分类标准而言,都要求尽可能客观。所以对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的把握,其客观性或曰可操作性远远不如对文学形式(体裁)的把握,“特别是体式稳定,实践操作已多惯性的古老体裁,若诗、文、词这些作为人们抒情述志的主要文体,其创作实践犹受自身格式所制约”。(《近代词史札论》)^①某种文学体裁一旦形成,就有相当强的稳定性(一旦改变了即是新的体裁),不论是诗、词还是曲,今人的创作跟古人都有着共同的轨范。所谓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其实首先就表现在文学体裁的增加,然后是某种体裁的主流地位的形成、各种体裁随时代的流变以及某个时代某种体裁对后世造成的整体印象。就本书所讨论的内容而言,如果以一般所谓“近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的界限来划分,则南社(1909—1923)恰好处在近代、现代交替之际,而很多南社社友也同样经历了近代、现代两个历史时期,对他们的研究显然不能腰斩为两截。而就“词”这种文学体裁而言,自唐代迄今的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大量的作品,尽管其思想内容随作者、时代的不同而各异,但是其作为词的规则却是基本不变的。同其他文学体裁一样,词自产生以来,尽管在不同的时代或者有过兴衰,但是并没有消亡,词的发展史有一个完整的序列,也不能因为文学史的分期而被人为地割裂。

目前的断代词史一般止于清词,而所谓“近代词史”又包括晚清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这样如“清末四大家”既可归入清词史,也可归入近代词史,而实际上四大家中除王鹏运之外,其他三人都已经步入民国时期,而且民国时仍然有重要的词学活动(创作、理论或文献纂辑)。事实上整个民国时期(包括“五四”以后的“现代文学”时期)词的创作仍然非常活跃,不论是满清的遗老旧臣,还是新进的文坛晚辈,都不乏作手。而词学研究更是方兴未艾,开启了现代词学研究的新篇章。所以如果以断代词史的眼光来看,则“清词史”与“民国词史”之划分或者要比“近代词史”更为合适。而南社作为晚清以来最大的文学社团,其成员中就有相当数量的词人,而且有不少人堪称名家,但是目前对于南社词的专门研究还不多见。所以不但民国词史的研究应该被提到日程上来,作为民国词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南社词人的创作与研究活动也应该引起关注。

那么研究南社词人的意义究竟何在?个人以为,南社词人研究的价值之一,在于对民国词史一个侧面的勾勒。词史的发展有客观的轨迹,研究任

^① 《近代词钞》,第3页。

何一个时代的词史,其主要内容都不外乎词人行迹、创作和词学三个方面。有清一代,词学号称中兴,不但词人数量空前,词人之交游非常兴盛,而且创作和理论也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清代又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自入民国,白话新文学迅速崛起并且成为主流,在人们的潜意识之中,这似乎也意味着整个古典文学时代的终结;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对民国文学的态度,除了左翼文学之外,其他基本上都只是“仅供批判”,民国词作为旧文学的一种被人为地封杀了。时至今日,很多人(包括一些专业的学者)对民国词仍然接触不多,整体印象相当模糊。以上种种原因使得民国词在整个词史上没有一个正确的位置。但是民国词的研究实在不应该被忽略。首先,民国时期的词创作相当繁荣,尽管一般看来,其成就无法与前代相提并论,但这也未尝不是由于读者对民国词人欠缺了解造成的。其实在民国时期,尤其是民国初期,活跃在词坛上的词人很多都是从前清走过来的,由于亲身经历了社会政治的剧变,他们的创作更趋于老成,感慨也更深,成就不可小觑。就南社而言,其主要的文学成就在于诗,所以一般对南社的研究也大多聚焦于诗,而词也就相对被忽略。其实南社词人是近代以来一个阵容庞大而且颇有特色的创作群体,自然应该而且也值得对其中的作家、作品作一番整体的、较为深入的审视。

其次,民国时期的词学研究成就相当突出,在某些方面明显超越了前代。民国词学既继承了词学批评的传统方式,又开创了现代词学研究的新局面,南社的一些词人和学者对此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曹辛华、张幼良在《中国词学研究》一书中专列“南社诸子与传统词学的新变”一节,并云:“之所以将‘南社诸子的词学研究’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一方面,由于南社诸子在时代风潮的感召下,其最初的社会角色、文化心态、知识结构、认知模式、价值体系、审美情趣等方面有着相似之处,由此形成了一个词学研究群体,尽管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这一群体显得较为松散;另一方面,在胡适、陈独秀等人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之前,由于南社作为革命团体这一性质,相对于传统词学研究,南社诸子的词学观表现出了诸多‘新变’。如果说王国维、梁启超乃至况周颐等是以个人的影响力来促使词学研究发生‘新变’,而南社诸子则是以群体的力量使得词学研究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南社虽只是一个在一定时期出现的社团组织,但它的解体,并不意味着南社诸子的词学研究活动也随之完结。这在论述词学研究时就必须顾及南社诸子的全部。”^①

① 曹辛华、张幼良:《中国词学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

应该说这种看法是比较客观的。

总的说来,南社词人群是清末民初一个庞大的、有成就的然而却未受到足够重视的群体。对南社词人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纠正历来对南社文学的研究只偏重于诗的状况,另外对于认识民国词史的全貌也有重要意义。所以本书的首要任务,在于较为系统地介绍南社词人的行迹、创作和词学,以期人们尝一脔而知全味,对久已蒙尘的民国词史增加一些了解。

南社词人研究的价值之二:古典文学的现代命运之探索。古典文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是在日益现代化的今天,也不应被遗忘。而一种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当然需要依托一个合适的社会生活环境。词之所以在宋代达到高峰,即与其时社会经济生活的高度发展分不开。同时毋庸讳言,古典文学的创作和批评因为需要相当的文化素养(其实就是一种“准入门槛”),导致其在事实上一直是属于小众的活动。在中国文学史上,越是到后来,诗歌越为文人(知识阶层)所垄断,“雅”与“俗”也在不断地分流和递迁。清末民国时期是传统文人士大夫生活的回光返照时期。自此以后,那种诗酒雅集、酬唱往还的文人生活,即被视为陈旧酸腐而遭到批判和嘲笑。事实上雅集、酬唱不仅仅是文学上的交流切磋,同时更是传统文人普遍可以接受的交游模式。更重要的是这种交游模式造就了一个巨大的文人网络,它最终形成一个看不见的浓郁的文化氛围,对于文学创作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民国时期传统的文人结社活动仍然非常活跃,这也是当时旧体文学创作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本书将“南社词人行迹”列为研究的一个焦点,不但是想给南社词人群体的研究提供一个全方位、立体的视角,也试图从中窥探清末民国时期传统文人生活的侧面,进而思考古典文学创作没落的种种原因。

任访秋曾指出:“(近代文学)所表现的深刻历史价值和意义在于,它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的承续与终结,另一方面又是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先声。……作为历史‘中介物’——过渡转折期的近代中国文学,其承先启后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也正因为如此,它本身也就不可避免地呈现出过渡转折时代所特有的矛盾性、复杂性和多重性。”^①清末民初是一个社会大转型时期,也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大转型时期,中与西、新与旧一直在斗争中纠结,革命激情的鼓荡与国粹情结的坚持,使得新文学与旧文学令人遗憾地变得水火不相容。歧路当前,文化激进主义者与文化保守主义者终于分道

^① 任访秋:《中国近代文学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扬镳。在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之下,词在近代文学转型过程中的境遇也有其独特之处。作为一个曾经引领潮流、最终又被新潮流抛弃的文学社团,南社在政治革命风起云涌之际,义无反顾地充当了革命旗下的先锋;而在文学革命蓬勃兴起之时,却又显得彷徨无措,最终分崩离析。本书试图以南社为例,探讨词的创作在这个转型时期所受到的影响,以及词的创作走向衰落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除了外在的新文学的冲击之外,词本身是否也有某种缺陷,使得它的衰落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这不仅是词史上应该探究的问题,实际上它也代表了古典文学在现代社会的一般命运。

二

关于南社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都只是有关社友的一些文史资料性质的回忆文章,真正的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其中以王晶珪的《南社始末》^①为代表,该文系统地考察了南社的活动,探讨了南社的演变过程。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该文的政治主导意识非常明显,无论是对南社史的分期还是南社文学评价,都紧扣政治来展开,有些地方不免失之偏颇。其后对于南社成员的资料整理和个别研究(如文集、传记等)也渐渐开展,但是主要集中在一些知名政治人物或者学者身上,如黄兴、宋教仁、居正、雷铁崖、景定成、黄侃等等;真正就南社文学而言,也往往集中于少数几个人物,如苏曼殊、柳亚子等人。而且这个时期尽管关于南社的研究已然开展,但是“南社”却并没有作为研究的主题,这种孤立的、零散的研究,严格来说甚至还不能算是有意识的南社研究,只不过这些人恰好都曾都是南社社友而已。而在一般的文学史著作上,从与南社大约同时代的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到以后各高校通行的文学史教材,论及近代文学时,虽然有些会谈南社,但是往往篇幅不多,而且大多数论述的重点仍然集中于柳亚子等少数几人。第一个对南社作出较高评价而且论述较为公允的是任访秋的《中国近代文学史》,该书曾为南社开辟专章;其后郭延礼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三卷),则更为南社专辟三章,这些都说明南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开始得到学术界的重视。但是这些著作也都存在一些问题,最显著的就是评价南社文学基本上都是着眼于诗,而很少论及其他;另外,所谓代表作家的代表性仍然不够,相当多卓有成就的南社作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1989年5月4日,国际南社学会成立,会长为南社社友、柳亚子之子柳

^① 见《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

无忌(1907—2002),秘书处联络地址设在香港大学中文系,该会编有《国际南社学会丛刊》,供南研学者和会员发表著作,至2003年已出7期;该会又与国内出版社合作出版“南社丛书”,至今已出版三套十余种;另外又曾资助一些学者出版有关南社研究的学术论著,近年学会更准备编辑出版一套新的南社艺术丛书,尝试从书画艺术的角度,把南社的成就重新定位。^① 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②则于1990年11月13日成立于北京,以柳无忌为名誉会长,编辑的会刊名为《南学通讯》;此外各地专门的南社研究团体也先后成立,如江苏省南社研究会(1994年成立,有会刊《南讯》)、云南省南社研究会(有会刊《云南南学》)等,近年来更多的南社研究学术机构相继成立,如上海南社学研究中心、苏州市南社研究会、中华南社学坛、泰州南社文化促进会等等,吸引了大批学者和热心于南社文化的社友后裔和各界人士的加入,至此“南社”研究成为“南学”,在海内外的社会影响迅速扩大。

20世纪90年代以后,关于南社研究的单篇文章大量增多,据不完全统计,自1994年至2001年,已达到450余篇^③,但是其中回忆性的文史资料类文章仍然占有很大的篇幅,学术性的论文仍然不够。具体说来,除了单篇研究文章之外,当前关于南社的研究资料主要有:

一、原始资料。其中尤以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出版的《南社丛刻》以及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出版的《南社湘集》最为集中;其次就是“南社丛书”中的诸家别集,如《高旭集》、《高燮集》、《姚光集》等;另外就是各地出版社零散出版的南社社友别集,如《姚鹓雏诗词集》、《黄人集》、《吴梅全集》等;以及一些由南社社友后裔整理出版的家刻别集,如《叶楚伦诗文集》、《南社张素诗文集》、《陈去病全集》、《丘复集》等。另外还有大量民国时期出版的各类社友著述,以及未能整理刊行的稿本、抄本等,分散藏于各地图书馆。至于社友当时发表于报章杂志的作品,其数量更是难以估计。其他如《南社纪略》、《南社丛谈》、《南社诗话两种》等资料汇集也非常重要。

二、研究专著。其中关于社友评传的有《南社人物传》、《居正传》、《黄

① 杨玉峰:《柳无忌教授和南社研究——悼念柳无忌教授》,国际南社学会秘书处编:《国际南社学会丛刊》第七期,香港:国际南社学会,2002年,第175—178页。

② 该会目前已转为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中国近代文学会”下属的二级学会(南社与柳亚子研究分会)。

③ 金建陵:《网络时代的“南社”研究》,金建陵著、张末梅编:《墨痕微漾》,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9页。

侃传》等,还有将传记与作品选结合的,如《吴梅评传·作品选》、《吕碧城评传·作品选》等,这些对于增进读者对南社的了解有相当的帮助,但是相对于南社这个庞大群体而言,仍然显得很不够。而且如《居正传》、《黄侃传》等,重心也完全不在文学。关于南社历史的有《南社》、《南社史长编》、《民间的文人雅集——南社研究》等,其中《南社》一书出版较早,政治导向性比较明显;《南社史长编》将有关南社的史料编年罗列,内容相当丰富而且翔实,叙述也较为客观平允,惟限于篇幅,很多重要文献只能节选;《民间的文人雅集——南社研究》则主要是从社团史的角度进行研究,“不作具体的创作分析,也不着意于对南社文学成就的深入揭示”。^①显然对南社文学的关注仍然不够。

其他侧重于某种文体的研究有《南社戏剧志》、《南社小说研究初探》等;侧重于社友行迹的文化研究有《南社文人与日本》等。这些反映出南社研究正在日益深入。

三、学位论文。从事南社研究的专业科研人员以前并不多,而主要是南社社友后裔和一些对南社有兴趣的文史爱好者。近来南社研究渐有升温之势,高校科研人员逐渐成为南社研究的生力军。其中以山东大学孙之梅的《南社及其重要诗人研究》(后修订为《南社研究》出版)、华中师范大学卢文芸的《变革与局限——南社文化论》(后修订为《中国近代文化变革与南社》出版),以及台湾师范大学林香伶的《清末民初文学转型期的标志——南社文学研究》三篇博士论文最有代表性。三位女士的论文有两个共同之处:其一,是关于南社史的论述占了很大篇幅,这一方面是因为南社与近代历史息息相关,故有必要为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以前对于南社所作的系统研究比较薄弱,一般读者对其仍然比较陌生,故不得不为之。其二,对于南社的研究,三位主要都是从宏观着眼,把南社置于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之下,探讨其文化心理和文学创作的动因和特色。但是因为南社文学的涉及面非常广,除传统的诗、词、曲、剧、古文、小说之外,尚有各类新文学创作,而且也都有相当的成就,如果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绝非一篇博士论文所能涵盖。所以尽管三位的成绩斐然可观,但就“南社文学研究”的大题目而言,仍然不免疏漏;而如果以“南社研究”为题,则除以上文学内容之外,势必还应该涉及清末民国时期政治、学术、艺术等等更为深广的内容,其难度显然倍增。

^① 栾梅健:《民间的文人雅集——南社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2页。

进入 21 世纪,有关南社的学位论文大幅增加。据不完全统计,在 2000 年以前,直接有关南社研究者仅有 5 篇硕士论文(包括港台地区),而自 2000 年起至今,已有博士论文 35 篇、硕士论文 291 篇(详见附录 A1)。其中有关南社文化总论及南社群体研究者 17 篇;而有关社友个人者 313 篇(另鲁迅与南社 1 篇),涉及社友 77 人,简略情况如下表:

姓 名	篇数	姓 名	篇数	姓 名	篇数	姓 名	篇数
黄宾虹	31	苏曼殊	26	吕碧城	15	李叔同	14
戴季陶	13	周瘦鹃	12	夏丐尊	12	黄 侃	11
任鸿隽	11	于右任	9	宋教仁	8	成舍我	8
邵飘萍	8	欧阳予倩	7	柳亚子	6	黄 兴	5
马君武	5	林白水	5	吴 梅	4	沈钧儒	4
吴 虞	4	洪炳文	4	陈去病	4	黄 节	4
胡先骕	3	唐群英	3	马叙伦	3	包天笑	3
汪精卫	3	吴梦非	3	谢无量	3	徐枕亚	3
陈布雷	3	胡朴安	2	居 正	2	邹 鲁	2
杨杏佛	2	李根源	2	梅光迪	2	江亢虎	2
易白沙	2	萧公权	2	张相文	2	傅熊湘	2
姚鹓雏	2	宁调元	1	张 继	1	柏文蔚	1
林庚白	1	叶玉森	1	邵元冲	1	陆澹龢	1
范鸿仙	1	陈 范	1	经亨颐	1	赵式铭	1
陈蝶仙	1	李定夷	1	高吹万	1	张 素	1
高 旭	1	许指严	1	杭辛斋	1	冯自由	1
雷铁崖	1	张默君	1	范烟桥	1	易大厂	1
申 桢	1	沈尹默	1	徐蕴华	1	胡怀琛	1
陈 柱	1	邵瑞彭	1	邓尔雅	1	石 瑛	1
成本璞	1						

从内容上看,这些论文涉及文学、历史、政治、教育、新闻、翻译、艺术、法律、宗教等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也足以说明目前南社研究正在全方位地不断深入,尤其研究的眼光不再局限于通行文学史提及的少数几个人,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不过目前的南社研究,依然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

首先是研究内容非常不均衡。第一,南社社友近 1 200 人,上述论文只

涉及 77 位社友,只占非常小的比例。而且很多论文虽然研究的是南社社友,但是论文中“南社”这一标签并不突出。或者说,作者并没有有意识地将研究对象纳入“南社研究”这一范畴。第二,南社社友虽然在社会各领域都有突出的贡献,但是南社毕竟是一个文学社团,文学才是南社的核心和基础。可是粗略考察目前有关南社的学位论文,文学类论文有 70 余篇(其中诗歌 31 篇、小说 19 篇),不足四分之一。论文题目直接与词有关者仅有 12 篇(其中吕碧城占 8 篇),以南社 200 名词人的规模来看,比例实在太过失调。而上表中除吕碧城外,研究最集中的几位社友,如黄宾虹研究主要是着眼于艺术、戴季陶研究主要着眼于政治等等,与文学的直接关系不大;苏曼殊研究则主要着眼于小说、李叔同研究则主要着眼于艺术和宗教、夏丐尊研究则主要着眼于教育、黄侃研究则主要着眼于学术。

其次是研究思路仍然较为陈旧。例如在文学研究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偏重于政治,强调南社文学一度在政治上的先进性;在进行作家个案研究时,也往往把注意力集中于一些所谓“进步”人士身上,这其实是一直以来片面强调文学“思想性”这一观念的反映。但个人的文学成就与其政治觉悟显然未必是同步的,“思想性”也并非衡量文学价值的惟一标准,所以这种研究方式难免有些误区,导致一些有较高文学价值的作品因为其作者在政治上的“落后”或“反动”而被忽略甚至被埋没。这也是造成人们对南社的一般印象产生偏差的原因之一。

再次是研究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和低水平重复。以往文学史述及南社时,即使为南社开辟专章,多数也仅就诗(偶尔论及词)着眼而不及其他。但是南社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所以他们在论及小说、戏曲、翻译文学等等的时候,又必须涉及很多南社的重要作家,造成体例上的某种混乱。而就学位论文来看,由于当前高校研究生数量急剧增加,很多学位论文选题没有经过很好的调查论证,相互之间信息交流也难以畅通,造成相当程度的重复劳动,这个问题尤以硕士论文较为明显。

三

研究南社文学,首先必须界定“南社文学”的内涵。林香伶博士曾经对此作过探讨,她根据南社雅集和《南社丛刻》把社友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积极参与雅集及《南社丛刻》创作的核心人物”;二是“只参加雅集,不从事《南社丛刻》创作者”;三是“甚少参加雅集,只从事《南社丛刻》创作者”;四是“仅在南社列名,甚少参与雅集与《南社丛刻》者”。林香伶认为第一、三类在南社文学的投入较多,可列为南社代表作家;第二、四类的社外创作不可

“挂名”在南社文学之下^①。林文又言：“社员在1909年之前所从事的文学活动当然也不能归入南社文学成就之列；同理，1923年之后的旧南社社友的文学活动，也应排除。”^②不难看出，此说基本上是以《南社丛刻》收录作品为标准来划分。但是《南社丛刻》虽然是南社的代表刊物，却没有什么集中的主题，而且由于其“编而不选”的特点，其内容非常芜杂，也远远不能够反映社友文学创作的全貌，一些社友的同时期“社外”创作的成就绝不在《南社丛刻》所录之下，如果把这些都排除在“南社文学”之外，不免有些因小失大。而且在第四类中，“甚少”也很难定量，究竟多少篇以下才算“甚少”？可见这也不太合理。

从理论上说，最准确的“南社文学”应该界定为：南社社友在南社存在时期的文学创作。但是这种界定实际操作起来却相当困难，因为不少作品的创作年代很难精确考证，而且如此一来连《南社丛刻》中的很多作品都要排除在外，因为《南社丛刻》中就收录了很多社友在南社成立之前的旧作。更有甚者，有些人还没有正式加入南社，但是《南社丛刻》中就已经收录了他们的作品。鉴于这种情况，本书对社友创作时间的限定从宽，对社友身份的认定则从严，故本书所谓的“南社”，不包括新南社、南社湘集等等南社的余响（这些都归入“交游”之列）；所谓的“南社社友”，仅指列籍（旧）南社名单的社友；而“南社文学”，相应地是指南社社友之文学；同样，“南社词”即是南社社友所作之词，“南社词学”亦即南社社友之词学，皆不限定其写作之年代。

如何从纷繁的史料和庞杂的社友群体中找到一条较为清晰的思路，也是南社文学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如钟敬文所言：“拿南社这个当时进步的文学团体及其社员的问题来说罢，对于它的基本性质和一定时期社员大致的共同倾向固然应该首先弄清楚，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对这个社团的‘革命性’给予精确的、科学的分析，对集团中那些不同作家的政治态度、文艺思想等的差异也应该作比较详细的探索，他们的共同风格与某些作家的特殊风格，也应该给以鉴别和详断。”^③这种意见是非常恰当的。

本书的主体结构分为三个部分：即南社词人行迹、南社词人创作和南社词学研究。而在具体内容安排上，则按照“以史辅文、由点及面”的思路进

① 林香伶：《清末民初文学转型期的标志——南社文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台北：台湾师范大学，2003年，第134页。

② 《清末民初文学转型期的标志——南社文学研究》，第49页。

③ 钟敬文：《谈谈近代文学研究的一些问题》，《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第一辑，第4—5页。

行。词人行迹包括南社词人在南社内部的重要活动以及南社词人与社外文人的交游。而需要说明的是,古典文学发展到晚近,已经罕有纯粹的词人,或者说词人也都兼具诗人之身份。所以本书所谓“南社词人”的行迹,虽然也尽量紧扣“词”的主题,但并非仅仅指其人与词有关的活动,而是指其人整体的交游活动(包括加入各种文艺社团等)。当然本书也注意有所侧重,例如关于南社历史,已有《南社史长编》、《南社人物传》等出版,故本书不再赘述,惟就与文学关系较为密切者详加评述。

至于“由点及面”者,“点”指的是典型的事件、社团、人物等。如行迹编中柳亚子的改革对南社社务、社刊的影响,以及南社词人参与的重要的社外社团等等。创作编也选取南社各领域的重要词人为典型,南社社友才雄气盛、著述宏富者不在少数,如果一一为之剖析,显然也不可行,故只能先作总体概览,再选择其中的一些重要作家分别论述。词学编也以南社学人的重要词学著作为例作重点研究。“面”则包括众多词人的交游及其特点、词人群体的创作以及论争、南社词与词学的整体面貌和独特内涵,以及其演变历程等方方面面的内容,而最终的目的则是将南社词人放在立体的文化视野之中,观其在横向与纵向的时空之中所占的独特位置,以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文化的某些特征。另外,词在民初以迄今日乃至将来不同时代环境之下的历史命运,也是一个值得反思和关注的问题,本书最后也试图对此略作探讨。

最后要说明的是,由于涉及大量的统计,故本书表格较多,为正文行文之洗练计,这些有关原始资料整理的统计表格之类,与词没有直接关系者,一般都置诸附录之中。至于脚注的参考文献,为节省篇幅计,只在第一次出现时注明详细版权信息,再次出现时一般只注明文献名及页码(不同作者的同名著作则加注作者名)。此外,有些与本书主旨关涉较浅不宜展开,但是关乎历史背景或文本阐释乃至作者观点,皆归于脚注之中,概不阑入正文,以示区别。

四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来自儒、道两家,文学也不例外。儒家传统的文学观其实就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文学观,所谓“兴观群怨”,所谓“诗教”,所谓“诗以言志”、“文以载道”,都不外如是。这种“言志”派的文学观强调的是文学的某种社会功用,即借此可以宣扬某种伦理或价值观念。而另一方面,“言情”派的文学观——追求唯美的境界或个性的张扬,则是来源于道家思想。“儒家对待文学,往往律之以道德,劝之以实用功利,戒空想。道家却

相反,教人超脱尘世,无为而为,想象自由。”^①但是实际上“言志”与“言情”也不可能严格地区分开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志”也是“情”之一种,狭义的“志”与“情”就是分别对应个人情感视角上“公”与“私”的两面,“志”即是着眼于“公”的情感,“情”一般而言即是着眼于“私”的情感。从中国文学史的整个发展阶段看来,儒家的“言志”派无疑占了上风,借助官方意识形态对儒家的支持,它以“公”这面大纛压倒了言情的“私”。例如《诗经》中的“言情”文学一直被儒家占有和曲解,可谓是扬“公”抑“私”的明显反映。然而无论如何,文学之所以动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能够以作者之真情引起读者情感上的共鸣,“情”之一字乃是诗词等文学形式的灵魂,就作者而言,贵有兴发;就读者而言,贵有感动——这也是叶嘉莹在诗歌批评中三致其意的“兴发感动”之义。

近代文学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政治性,而其实质也就是功利性。自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维新派开始把政治热情投入到对民众的思想启蒙中来,文学成为他们首选的工具。梁启超曾相继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革命”、“戏曲革命”等口号,便是试图以文学的平民化、通俗化来推动民众意识的转变,促使其从封建的禁锢之中解脱出来,这就是一种“觉世”的文学思潮。后来的革命派也好、“新文化”倡导者也好,也都是有意识地以借助文学来实施启蒙,希望能够促进多数的国民觉悟,以达到救亡和富强之目的。身具政治性和文学性两重身份的南社,当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南社文学自一开始便有明确的功利性,即希望以文字鼓吹来宣扬革命、配合政治,“他们强调文学的现实性和战斗性,要求它具有社会内容,反对无思想性,反对卑微狭小的个人主题的吟咏,也反对‘取悦于世’的‘和平柔顺’之言”。^② 尽管南社流品颇杂,政治观念、文学观念都不尽一致,即便是就革命派而言,他们所主张的也并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但是他们崇尚“公”而鄙薄“私”的意识却无疑是主流,反映这种内容的文学也被视为最有南社特色的文学。而所谓“卑微狭小的个人主题的吟咏”,便是狭义的“言情”文学,所谓“取悦于世”的“和平柔顺”之言,便是“媚世”的文学。

功利的文学观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未尝不是进步的,但就文学本身而言,过分强调功利性无疑会对其艺术本质造成戕害。借文学来宣扬某种价值观

① [日]青木正儿著,孟庆文译:《中国文学思想史》,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1页。

② 杨天石、刘彦成:《南社》,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3页。